《日本汉诗史》的汉诗史观，带有明显的尊皇思想。这种汉诗史观较之《日本诗史》的“我邦”色彩更进一步。如前所述，江村北海认为诗的本质是汉土声音，并没有与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作彻底分割。但到了菅谷军次郎这里，可以看到他试图在叙事中将中国对于日本汉诗，乃至日本汉学的影响边缘化。

以《日本汉诗史》对汉学传来这一事件的建构为例。作者认为，中国进入到这一事件中，要到日本推古天皇时期，也就是日本官方和向隋唐两朝正式派遣使者开始。在此之前，汉学的输出与受容，全以百济和日本为中心。然而，即使中日两国展开官方往来，中国仍然处于这段叙事的边缘地位。作者详录当时在朝廷中担任要职的百济人士姓名及官职。被称为“汉诗之祖”的大友皇子，也是受到了百济贵族沙宅绍明的指导，以至能写汉诗（6）。同样认为大友皇子始作诗赋，江村北海只言“典重浑朴，为词坛鼻祖二无愧者也大友”（10）。因此，对比《日本诗史》的写法，《日本汉诗史》在建构汉学传来这一事件时，采取的是突出百济的策略。

对于“什么是汉诗”这一问题的回答，《日本汉诗史》通过比较日中两国诗的起源作展开：

“**汉诗**兴起于皇室，是值得祝贺的。在中国，《擊壤歌》（老人作）、《康衢歌》（小童作），以及《尧戒》的‘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’，这些诗篇虽然被认为是中国诗的起源，但根据森槐南博士的考证，应当认为商颂五篇才是中国诗的源头。所谓商颂五篇，指的是《诗经》中的《那》，《烈祖》，《玄鸟》，《长发》，《殷武》。这些都是臣子作的诗。从这点来看，日本和中国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。”（8）

在这里，菅谷军次郎区分了“诗”与“汉诗”。“汉诗”并非汉土声音，而专指皇室首先创作的一种韵文。而“诗”，可以指臣子之诗，也能指百姓在劳动时吟唱的歌谣，本来是一个中性的表述。对“汉诗”与“诗”的作者身份的标注，并非就两者的艺术价值作区分，而是意在突出万世一系的皇统。

对皇统的推崇也体现在《日本汉诗史》对汉诗功用的总结中。彼时是所谓皇纪二千六百年，即昭和15年（1940年）。在日本当局宣扬国威的一系列活动中，尤为引人注目的，是在宫崎市建造的八纮一宇塔。“八纮一宇”作为二战时期日本的国家格言，目的是为了动员国民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汉诗的实用功能就被尤为强调。作者认为，幕末尊王攘夷的藩士藤田东湖、吉田松阴等人的诗可以激发国民的慷慨之气、忠诚之心；同时，军人的诗也有助于养成刚健的气质和义勇奉公的决心（451）。尽管他反对将汉诗纯粹作为道德的教材（453），但从他的论述看，他并不反对，甚至乐见汉诗成为动员国家精神的意识形态工具。